

◀（上接 11 版）

是写给将军与政治家看的。

要论客观，那他的书当然是但却不仅仅是客观研究，而是研究之后的生动讲述。不妨类比说，客观研究的成果，是发掘出某一段真实历史的“巨石”，虽则客观，但浑然莫辨；出色史家则能在这块巨石之上，描画出若干生动影像与重大事件；但修昔底德则目光锐利，手持刻刀，乱石纷纷之余，呈现于世人的是一件巨幅历史石雕——坚硬而突出的历史事实，以及事实所讲述的深刻政治意味。

现代学界在历史编撰学方面的争论素来兴盛，在此简举三例。一是约翰·芬利(John H. Finley，注意不要与另一位著名古代史学专家摩西·芬利[Moses I. Finley]混淆)，其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 1942)与续作《再论修昔底德三篇》(*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 1967)，某种意义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承接现代早期修昔底德研究者的主要论题与成就，同时又有重要研究推进，深深启迪了当代学者。第二位是法国学者罗米莉(Jacqueline de Romilly)，其论著《修昔底德的历史与理性》(*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 1956；英译本则为 *The Mind of Thucydides*, 2012)，深受芬利启迪，在核心观点上强调，修昔底德之书既是一部基于理性研究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写作艺术的论著，它所尝试提供的教益并非完全直述于文字，而是隐含于他对不同事件的详略处理与精心章节安排，以及充满修辞乃至审美的文字书写。该书一出，即引领一时风潮，甚至直到今天。第三位代表可举霍恩布勒尔(S. Hornblower)，在前文已举大型评注外，另有《修昔底德》(*Thucydides*, 1987)一书，仔细论辨修昔底德书写中的演讲辞、证据使用与论证、观点的表达方式等等，卓然大家之作，不容错过。以上三位学者论著可堪代表。

### 历史问题研究

修昔底德宣称他的书，非为愉悦时人而作，而是要成为一项“永久财富”，对于探寻这项财富，以上文本阅读与历史编撰学都只是预备，而实际的探宝之旅——修昔底德所谓借以确切知晓“过去之事”即所书写的这段战争历史，并能清楚判断人类还将一再出现的类似之事——则要进一步依赖

于历史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研究。可以说，从历史问题研究开始，修昔底德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就一步步到来。

既有研究可举四例。一是前文已提及的法国学者罗米莉，在此可举她的《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1963；法语原版, 1947)。作者基于深厚学养，同时在历史编撰学、历史问题研究，甚至包括政治哲学三个层面上，综合处理了修昔底德在思想维度上与雅典帝国的复杂关系。该书近乎“终结”式地解决了德国学者自19世纪以来反复争论的所谓“修昔底德成书问题”(Die Compositionsfrage)，经综合论证后提出，修昔底德在前期可能是在分段写作与整理资料，但在战争于公元前404年结束之后，他就获得一个明确判断整场战争的时间基点，从而能更清晰更精确表述此前对战争各个关键问题的理解与判断，但他的思想总体上是坚实的，理性的，前后一贯的，全书应当被看作是完整一体的；基于这一结论，作者认为修昔底德对于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在全书是统一的，并且对于笔下的历史人物，修昔底德以底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为政治家的理想型，并几乎完全认同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帝国身上奉行的理想与政策。也许我们并不全部认同作者把修昔底德等同于伯里克利的雅典帝国主义，但全书论证详实，无疑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入阅读理解修昔底德。当然全书通篇大量引用古希腊文，读者若有一定语言基础或者精通，阅读中就会更为流畅愉悦。

其次可举卡根(Donald Kagan)及其四卷本“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69; 2. *The Archidamian War*, 1974; 3.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1981; 4.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1987)，探讨论证与史实重述合二为一，非常值得一读。其中第一本最为引人注目(有中译本《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全书都在与修昔底德争论，何为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这场战争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他的观点集中来讲就是，在修昔底德所述公元前431年—404年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还有更早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1年—445年)”，其终结就是雅典与斯巴达双方于公元前446年达成一项三十年和约，斯巴达据有陆地，而雅典占



英国历史学家圣科瓦(1910—2000)

取海洋，双方达至平衡而为和平奠定基础；其后的公元前445年—431年，雅典并未寻求大规模扩张，双方平衡没有实质改变，和平仍可持续，战争绝非不可避免；真正引起纠纷导致最终打破平衡的，不是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反倒是那些具体原因，比如科西拉、科林斯、麦加拉(Megara)等城邦的相关系列事件，修昔底德所谓“根本原因”在此并不存在。可以说，卡根与修昔底德的这一场争论，很值得讨论。

在此对卡根本人不妨加注一笔“外史”，他在这四卷本的扉页上反复题献给他“最棒的儿子”鲍勃，这也就是颇然大名的，广泛活跃于美国政界、智库与媒体专栏的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同时被题献的另一位，亦即这位罗伯特的兄弟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Kagan)，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史教授，现供职于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美国，基础学术与当前政治之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第三位要举出的是历史学家圣科瓦(G. E. M. de Ste. Croix)，在修昔底德研究上也以探讨战争的原因而著名，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72)以修昔底德为最可靠的史实来源，反驳所谓这场战争的挑起者是雅典的流行看法，严密论证认为斯巴达才是这场战争的挑起者，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修昔底德明确记载，斯巴达人自己就认为没有遵守和约，没有接受雅典提出的仲裁来处理纠纷，相反投票决议发起战争，并最终因为派娄斯(Pylos)之祸而自责不已。圣科瓦身上左派史学特征鲜明，他也以研究希腊民主与阶级问题而闻名。

最后一位想举出的学者是卡莱特(Lisa Kallet)，代表作是前后篇的《金钱、耗费与海军：修昔底德历史前五卷研究》(*Money, Expense, 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 History 1—5.24*, 1993)与《修昔底德笔下

的金钱与权力腐败》(*Money and Corrosion of Power in Thucydides: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and Its Aftermath*, 2001)。在此列为第四位，与其说是因为作品的突出学术地位，不如说是因为论题与研究方式的稀缺。现代学者一直批评修昔底德在战争与政治之外，少有关财政等经济史实与数据，而这种缺失对于现代政治研究来讲难以想象且不可接受；同时新近出土辨认出的铭文上，载有许多雅典帝国财政数据，与修昔底德史书不合，或为史书所缺，如古代经济史名家摩西·芬利就批评这是“惊人的缺失”。卡莱特这两本书开宗明义，要仔细考辨书中的数据问题，为修昔底德正名。

当然历史研究类作品远不止此，事实上其数量在修昔底德研究中也最多，读者不妨借助书中引注与索引自行前进。

### 国际政治研究

历史研究中广泛讨论的战争原因、雅典帝国、城邦联盟、海军财政等等议题，这些议题很容易就为国际政治学者所接手，可以说，修昔底德这部历史的核心就是一部国际政治史，书中人物的演讲、行动、希望或者恐惧，都无一不是国际/城邦间政治，或至少深深受影响于这一政治。而且学者也普遍认为修昔底德率先开创了国际政治研究，在此之前我们还找不到一本书，能拥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国际政治洞见。

但遗憾的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称引修昔底德虽最为频繁，但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广博不如历史，深刻不如政治哲学。就拿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来讲，据说借助译本通读全书而作深入研究的人，也远比想象要少得多，通常专业课程上选择章节来代替全貌。其“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李代桃僵，混淆修昔底德本人与其笔下的雅典人，典型例证



法国语文学家、古典学家罗米莉(1913—2010)

如著名的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论及现实主义原则与权力时，有两处引用指名源于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出于古希腊的经验而声称，‘无论是城邦还是个人之间，相同的利益才是那最可靠的联结纽带’”(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ition, New York, 1978, pp.8–9)，“对于诸神我们所确切知道的，’——在此引用修昔底德——‘而对于人类我们则确信无疑的是，但凡能够，他们就会施加统治，这是出于他们自然本性的必然铁律。’”(ibid., p.38)但实际查证，前者出自书中科林斯使节在斯巴达联盟大会上的讲辞，后者则是弥罗斯对话中匿名雅典使节的妄语。可见，最大多数时候我们所以为的“修昔底德现实主义”，实际不过是书中雅典使节或其他什么人的论调，这与修昔底德本人岂能简单混同？

但无论如何，国际政治学者对于修昔底德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往往最为敏感。20世纪以来，前有两战世界大战，后有漫长的冷战，在这种战争恐惧之中，人们比以往更多地重读、讨论修昔底德，在今天则因为类似的担心而再次予以热切关注。但要列举这一领域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却令笔者颇为尴尬，其一，完全集中研究修昔底德并呈现为大部头专著的作品很少；但，其二，修昔底德的影响力却又遍布20世纪以来重要国际政治学者，尤其现实主义学者，举凡较早的卡尔(E. H. Carr)、阿隆(Raymond Aron)、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到晚近的基欧汉(Robert Keohane)、奈(Joseph Nye)、沃尔兹(Kenneth Waltz)、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则无一不在论著中直接或间接述及修昔底德，如果一一列举，文献数量势必又过于庞大；其三，国际政治领域对修昔底德最为敏感，在我看来，原因之一是他的阅读与研究并不限于学院派，甚至应该说首先是实际的从政人物，比如前面